

士博文集

毛士博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士博文集

毛士博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士博文集/毛士博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 - 80647 - 451 - X

I. 士… II. 毛… III. 美术批评—文集 IV. J05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888 号

书 名:士博文集

作 者:毛士博著

出 版:
发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)

网 址:WWW. BHZWY. COM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江西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9.5

字 数:23 万

版 次: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2.00 元

ISBN 7 - 80647 - 451 - X / I · 307

邮政编码:330006 **电话号码:**0791 - 8503450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著名美术家、文艺理论家、
中国艺术院院长王朝闻先生
与毛士博亲切交谈

我国传统艺术中抽象图式初探

毛士博

关于具象与抽象，近几年来美术界展开了
的讨论，争论的焦点是抽象。从创作的角
说，由于这个问题带有带于根本的性质，
引起了广泛的注意，大家的看法也很不一
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，不必急于强求一致。
同时，这种平等的讨论问题的态度，也正是我
们长期以来所盼望的一种学术空气。这样的讨
论能引导我们上下求索，深入探究，对于艺术
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。

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，中国画论中“似
与不似之间的关系”就是具象与抽象之间的
关系。”（《美术》1980年第10期《关于抽象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



《滴水清清》（摄影） 载于1986年《江西画报》第1期



1949年底与江西省立新闻学校同学合影。前排左起第3人为毛士博。



摄于江西省美协会议期间（20世纪80年代）

江西日报社原文艺处全体同事合影，时值《江西日报》创刊40周年（1989年）。由左至右：崔龙弟、熊嘉龄、孙琳娜、王滋林、熊伟民、卢山樵、毛士博、刘峰、刘培松。

此处两幅照片是毛士博在
各地采风时所拍摄的工作
照片

1992年10月 摄于曼谷



1983年摄于西安



《我们是一家人》（木刻）
系毛士博发表的第一幅木刻
作品，载于1950年1月13日
《江西日报》，笔名小犊，乃初
学之意。



1994年秋摄于景德镇



《祁连山下》（摄影，1983年）



《卡尔·马克思像》
（木刻）发表于1950年
5月5日《江西日报》



挑米长途跋涉送我上陶校，此情此义我铭记在心，只是至今未报，深感内疚。)过早的超强劳动，不仅折磨了凯弟的身体，而且使他丧失了就学的机会，影响了日后事业的发展，伟姐琪妹也都因此读书很少，这都是难以补偿的遗憾！惟独我因身体瘦弱，母亲不忍心叫我下力作田，便着我随庶馨公读私塾。翌年，母亲又觉得读老书难以适应新时代，便咬紧牙关省吃俭用送我到新店里读高小，改名士博。这是母亲对我的特别关照与厚爱，母亲给了我生命，又给了我教育和爱心。她心地善良，品行高尚，聪敏过人，善女红，会剪纸，做得一手好花果。受母亲熏陶，耳濡目染，从小我便好涂涂画画，十岁左右便能仿古人笔意作立轴、中堂，日后我以绘画为业，并在当今画坛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基因即在母亲，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
由于母亲的苦心抚育，我侥幸度过了多难的前十年，到11岁，婆婆又突然病逝，这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，为支付医药丧葬费，家里再次卖掉了部分田产，家庭经济每况愈下，再也无力供我上中学。也许是时来运转，是年恰好华卿公祠新立起一条规矩：凡考上中学、大学的族人均资助一定数额的学谷，以鼓励子孙上进成才，光宗耀祖，这样我才得以有机会继续上学。

1941年我考入五年制的省立陶瓷专科学校（今陶瓷学院的前身），陶校因专业的需要特别看重绘画课，这正中我的下怀，使我有机会得到正规的绘画训练而能有长足的进步，为以后走上绘画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1943年全校举行绘画比赛我获得西画第一名，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。

陶校是由于战火的骚扰从景德镇迁来萍乡的，同学来自四面八方，不少是从战区来的“难民学生”，校长汪藩、舒信伟和教师戴亮侪、邹如圭都是我国第一批赴日本攻读陶瓷专业的留学生，国画教师范炯、西画教师褚昌言均系一代高手，从

山窝窝里走出来的我，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外面来的同学与学识渊博的老师，又亲历了陶瓷工业生产的全过程，觉得眼前的天地大了许多，抗日、民主、实业救国等思想逐渐深入了脑中，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岁月。

1944年日寇西侵，直犯萍乡，陶校被迫暂时停办（后迁回景德镇），我不得不离开陶校转学到普通中学——宜春袁山中学。其时政局动荡，抗日吃紧，政府腐败，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，学潮此起彼伏。袁山中学不久也爆发了学潮，全校停课，最后直闹到驻宜春的战区司令王陵基出兵镇压的程度。虽然庆幸一枪未发没有流血，但下令开除了十几位同学，我是此次学潮积极参与者之一（以画参与），但幸免未被开除，不知何故？我考虑到不能负情于被开除的同学，于是自动离开了袁中，转学到宣风中学。

在宣中一年，恰逢抗日胜利，全国上下一片欢腾，我又以绘画等方式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，这些活动占用了我不少学习时间，学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但思想收获较大，仍以优良的成绩毕业。

中学五年，一波三折，很不平坦，真正扎扎实实学了一点东西还是陶校三年，中学毕业我一直做着投考美专的梦，尽管东有杭州美专，西有武汉美专，但因浙赣铁路不通，家庭经济困难，未能如愿。这样就迫使我不得不选择暂谋职业糊口等待时机投考美专的路。事有凑巧，正在这个关口上，恰好有画友雷锦祥推荐我去长坪里小学教美术。当时失业严重，找份工作很不容易，虽然长坪里离家较远，我也欣然答应了。不过我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一步走出去便永远走向了社会。

执教长坪里时我年仅18岁，一年后该校因全面翻修扩建校舍而暂停办，我转而受聘于邻近长坪里的流江小学。寒假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经龚汝亮介绍认识了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叶蕃，在馆里小住多日，作画操琴，得到叶蕃的赏识。1948年夏末，

叶蕃改任萍乡县立中心小学校长，即聘请我为萍小美术教员，在当时这算是一份难得的美差。由此我便从乡村小学转而进入了县城最顶尖的县立小学，由山里人变成了城里人。在萍小执教一年，我的画便逐渐在县城有了一些声誉。

1949年6月，萍乡未放一枪便获得解放。形势的变化是平静的，又是惊天动地的，这是新旧社会的更替，两个不同制度转换的历史巨变。此时我刚好20岁，正进入人生最宝贵的青年阶段，遇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可称是运交华盖了。7月底我考入萍乡军管会主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，满怀激情地走上革命征途，这历史性的一步是我人生旅途的重大转折和质的超越。

青年干部训练班是萍乡解放后最早办的革命学校，负责人是史字谦，学习时间一个月。8月底，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学被保送到南昌，参加江西省委主办的省立新闻学校学习。

新闻学校是一座改造知识分子的革命熔炉。全新的观念，全新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来的青年（绝大部分是学生）完全变了个模样：穿的是粗布军装，吃的是馒头小米粥，每月只发几块钱零用钱（供给制）；唱革命歌曲，扭秧歌，情绪激昂；学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、剩余价值、资本积累，字字句句闻所未闻，论理深刻明晰，令我茅塞顿开，眼前是一个全新境界。11月，全校师生员工扛着枪，穿一色的军装，雄纠纠气昂昂前往丰城参加减租减息。这是第一次参加革命实践，神圣夹着神秘，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，生活单纯而又充实。我留在校部搞宣传，绘制了不少宣传减租减息、宣传革命的大型壁画，写了大量宣传革命方针政策的巨幅标语。年终回校总结，受到校方和同学的一致好评，荣立大功一次，并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（后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）。

1950年1月1日我由新闻学校分配到江西日报社做编辑工作，至今40余年。40多年中绘画摄影、烹文煮字，无不涉猎，成功失败，荣辱甘苦，甜酸苦辣，五味俱全。

最初是做美术编辑，每天忙着为报纸画插图，作漫画，做装饰，也刻过木刻版画，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950年5月5日发表于《江西日报》的版画《卡尔·马克思像》（当时印刷条件差，尚无照像制版，便以版画代之）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报纸宣传迫切需要摄影，任务落在我的身上，在一无设备技术，二无参考资料的情况下，我克服重重困难，创建了《江西日报》的新闻摄影事业，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新闻摄影采、通、编工作秩序，组建了全省性的摄影通讯员网。为购置摄影器材，1950年底我到了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上海，我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领略了大都市的风采，目睹了霓虹灯照红半边天的上海夜色。可谓大开了眼界，此后多次出差上海，亲眼见到上海的不断变化。

1952年受命出任美术摄影组副组长，主持全面工作。虽然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，缺乏经验，又无师从，倒也顺利称心。只是家乡的土改音讯全无，士伟姐已从萍乡调来南昌铁路子弟小学工作，弟弟士凯参军在宜春服役，妹妹士琪、士铨投奔文工团辗转农村参加演出，丢下母亲一个人在乡下，是好是歹一个人顶着。按当时的政策我们兄弟姐妹只能回避，不能过问，荣辱祸福，听天由命。很久以后才得知成份划定为“小土地出租”，这完全符合土改政策。然而土改复查时搞扩大化，形而上学盛行，下达“漏划指标”，将我家“扩”了进去，划为“地主”成份，从此母亲陷入了苦海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在那年月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造成的罪过，也是构成我们家无数悲剧的根源。

1955年4月应邀赴北京，参加人民日报社召开的全国摄影通讯工作会议，有机会见到了石少华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）、郑景康、敖恩洪、张印泉等老一辈摄影名家和俞创硕、袁毅平、赵慕志、张其军、徐永辉等全国各省市有影响的中青年摄影家，听取了石少华关于塔斯社新闻摄影工作的报告。会议结束的酒会上见到了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和张沛同志。5月1日参加

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盛大观礼活动，见到了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参加庆典的全体党和国家领导人。晚上参加了天安门广场隆重而热烈的焰火晚会，满天的焰火把我带进了梦一般美妙的境界。北京之行给我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此后我多次进京，亲眼看到了北京各个不同年代的巨大变化。

北京回来不久便开始搞肃反，接着便是反“右派”，反“右倾”，合作化，人民公社，大跃进，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左的思潮不断升温，唯物论、辩证法不见了。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受打击，受排挤，不少人被打成“右派”分子，由于报社领导的爱护，我庆幸没有遭受反“右派”运动的冲击。但是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大气候下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种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压抑、冷遇、歧视，甚至影响到家庭和事业。

1959年编辑部增设副刊组，我奉调到副刊组做文艺编辑。此时我31岁，面对的情况是：工作岗位的变动，熟悉的美术摄影要闲置，不熟的文字工作要迅速适应，国家面临三年经济困难。要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求生存、求发展，为此我付出了数倍于人的心血和代价。接踵而来的是左得出奇的“社教运动”和荒唐至极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国家经济濒临崩溃。人民被推向深渊，千百万知识分子蒙冤遭迫害，我也没有逃脱厄运，1968年无端地被遣送到机关农场劳动改造，此时我刚好满40岁，进入不惑之年。

不惑之年本是人生精力最充沛、经验最丰富、大有作为的黄金时期，我却要忍痛抛弃我的事业，含泪离开结婚方七年的妻子（陈秀兰）、五岁的女儿和年仅三岁的儿子。女儿海帆跟随外婆靠做纸花谋生度日，儿子红松随母亲下放黄马农村劳动、教书，苟延残喘；我母亲在张家坊、白石口孤守空房受煎熬；姐姐、弟妹音讯不通，此等生离虽非死别，其惨烈的程度则无异于死别，精神的摧残甚至更烈！五年的劳动改造，我像囚徒一样被

非法剥夺政治、通信和阅读书报等一切权利，工资被扣发，连“伙食尾子”也被侵吞。盛夏中午，烈日当头，我和金凯（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）被勒令在火辣辣的水田里撒化肥；数九寒天，我们俩泡在冰冷刺骨的河里洗刷农具；晚上我们俩蜷缩在猪圈的西头低矮的猪舍里与猪作伴，这惨绝人寰的日子委实不堪回首。

可幸宇宙有序，物极必反，“四人帮”之流蓦然间变成了历史的垃圾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。1973年年初，我从机关农场调回编辑部，编文艺副刊，家人才得以团圆，重聚南昌，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，儿女也才有机会循序上学，先后获得相应的学位。（海帆毕业于江西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，获学士学位；红松毕业于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光仪电脑专业，获硕士学位。）

我的青年时代——1949至1973这20多年，是大喜大悲，大起大落的悲喜剧。1973至1979年是众所周知的时局多变、政界处于异常微妙的时期，对于我来说是平平淡淡、无所适从、无所作为的时期，处于一种有人冷眼窥视而无人关心的状态。直到1983年受命出任文艺处副处长，主编文艺副刊，才真正摆脱了莫名的桎梏，走出了精神的牢笼，准备放开手脚潇潇洒洒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。然而不幸，两位受尽折磨的老人岳母和母亲相继逝世，我自愧未尽人子之责，留下无限的自责和遗憾——无可挽回的永远的遗憾！心中的块垒至今不得排解。

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，摒弃唯心论与形而上学，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科学态度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将濒临崩溃的中国从苦难的深渊挽救了出来，广大的知识分子也得以重新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，发挥应有的作用，我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一样获得了真正的解放。

1983年到文艺处之后，我先后走访了青岛、桂林、西安、

兰州、武威、嘉峪关、玉门、敦煌等历史名城胜迹，穿越雪线翻过祁连山走访了西宁、青海湖、塔尔寺，到过杭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海口以及三亚等著名城市。三次见到闻名国内外的文艺理论家、美学家、雕塑家、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朝闻，和他作了长时间的交谈，受益匪浅；在敦煌见到了被国外学人称之为“敦煌保护神”的著名油画家常书鸿教授，就敦煌艺术进行了访谈；在桂林见到了著名作家丁玲，聆听了她的长篇学术报告。1992年10月上旬应邀出访了泰国、香港，在泰国首都曼谷会见了著名摄影家陈达瑜先生。在香港会见了老朋友、贺氏企业董事长贺大行先生。在泰、港我着意采访了世界关注的热点——亚洲“四小龙”经济腾飞的情况，发表了《南洋观龙腾》的长篇报道。

近十年来的足迹所及、地域之广远远超过了前50年，因而视野大开，见闻大增，文思活跃，所见所闻好歹都变成了文字，凑合成篇，所以这些年是我发表文章最多的年月，我把它称之为迟到的黄金时期。

翻阅剪报，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不下百篇，比较有代表性、较有影响的有评论《周国桢的瓷雕艺术》和论文《我国传统艺术中抽象因素初探》等若干篇。《周国桢的瓷雕艺术》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论述了他的作品的艺术特色、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。著名画家刘海粟读了之后在他的《黄山谈艺录》中写道：我若再写文章评介周国桢的瓷雕，无异于“马齿徒增”，表示对《周国桢的瓷雕艺术》一文的肯定与称赞。《我国传统艺术中抽象因素初探》较早从我国民族与民间艺术传统的角度，对美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“抽象”问题，作了历史的切合实际的剖析，阐明了“抽象”与“具象”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特性，提出了对于抽象既不能盲目追求、滥用，也不能视为怪物拒其于千里之外，不肯定那些莫名其妙的抽象派作品，但应肯定艺术的抽象等论点，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朝闻的赞赏，并推荐发表于1983年

1月号的《美术》杂志。1984年此文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“建国三十五周年优秀作品奖”，并作为有一定代表性的论著载入《中国当代美术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。此外，报告文学《腰斩“大山村”》获得了1990年全省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，先后有《红壤之星》和《孔雀山传奇》两本报告文学集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）以及其它与人合出的集子出版。

这些成绩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有幸获得了社会的肯定，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不少荣誉。1980年经审核批准为中国摄影协会会员，1981年经审核批准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1986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席，同时当选为省文联委员，有关我美术、摄影活动的情况，已收入《中国美术家辞典》、《中国摄影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艺家传集》。1983—1992年被推选为省五届、六届政协委员，1987年经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资格评审委员会审核批准为高级编辑，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，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，享受政府终身特殊津贴，这算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中继句号吧。晚年的步履情状如何？最终的句号是否划得圆润？还有待于自己的努力。

人生是辉煌的，她充满希望与欢乐，
人生是悲怆的，她暗藏邪恶与苦难，
没有辉煌的人生必然平庸，
没有悲怆的人生流于苍白。
宠辱不惊，悲欢泰然，这是我走向胜利之魂，
我爱人生，祈望永远。

宛如平常一段歌

——也算序言

西璘

他在世时，我从未叫过他“老师”，可是当我肃立在他的遗像前，面对那永远亲切和蔼的面容，往事一幕幕如奔突的潮水般涌进脑海时，我禁不住心底呼唤他“老师”。

“老师”这个称呼也许是他最适合也是他最喜欢的，因为他一辈子从来就没当过什么“长”或什么“总”，近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中他从来都只是一个“者”或一个“员”。他伏案操笔留下的文字至少有几百万字之巨，但是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。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文稿为他人作嫁衣，他的绝大部分成果事实上都成了建造他人成果殿堂的一块基石。

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文艺评论居多。从国画大师到刚拿起照相机的农民，从陶瓷工艺美术家到初涉文坛的业余作者，他都倾注了真诚，评析作品深入细致，推介新人满腔热情。不知有多少人，得益于他的指点和扶掖而事业有成著作等身，而他，却始终默默无闻地继续在自己的编辑园地里耕耘。

他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报纸的文艺宣传。不论是在《江西日报》副刊当编辑，或在办《江西日报》星期刊，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，热情不退。为撰写或修改一篇稿件，他可以半天不挪身；为斟酌一个用词一个标点，他甚至半夜爬起来铺开稿纸。无论什么稿件，凡经过了他的手，绝无错处，篇篇都是成品、精品。他对工作的那份执着，那份投入，那份精心，他对待

新闻事业掏心掏肺的那份真情，所有与之结识的人都深为感动，难以忘怀。

我与他一起共事30余年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永远是那么和蔼，那么谦逊。瘦削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言语不多，而且始终是轻声细语，用的是商量的口吻而从来没有一句命令或任性。我似乎从未听过他喊，只听他说；从未见过他哭，只见他笑。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受那样非人的摧残和厄运，他对生活也始终保持着淡泊和宁静。所有跟他共事的人，没有一个与他结怨，没有一个说到他不表示尊敬。他似乎永远都与世无争，只想埋头做自己一份工作，尽自己一份责任。他一生的经历其实是坎坷，那平静的外表下深藏着的，是一颗对生活无比憧憬和挚爱的心。

他的多才多艺，在江西新闻界和文艺界也许迄今无人能与之相比。从这本集子里所收集的作品可以看到，他的文笔清新婉约，朴实无华，无论是评论、散文、游记或通讯报道，拿出手的都是上乘佳作。他的美术造诣在江西享有很高的地位，不仅是对美术作品的欣赏评析能力，而且自己的创作也显示出很高的水平。国画、油画、年画、漆画、版画、雕塑、摄影、盆景、陶瓷美术……他样样精通；电影、戏剧、曲艺、文学创作……他门门在行。能写，能画，吹拉弹唱，似乎文艺的十八般武器都集于一身。他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，也从未参加过任何学习培训，却敢于对诸多专门领域涉猎，表现出极高的灵性和悟性，体现出一种超常脱俗的高品位和高素质。

他匆匆地走了，就像他一生那样平静如水，然而他留下的累累硕果和行为风范，却像高山行云。

他的妻子儿女为他编辑的这本集子，我的感受，就像一句流行的词：“宛如平常一段歌”。他的为人，他的处世，他的作品，都值得我好好学习。值此《士博文集》出版之际，请让我喊一声：“士博老师，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。”